

“梦想,追求,是人的生命、群体的生命,也是一个国家的生命。”

“当一个梦圆了的时候,我们又开始追求另一个梦。渴望去做另一件力所难及的事。梦的呼声唤起新的梦,循环不已,生命不息。”

且喜梦多梦酣,何计梦破梦圆。”

——黄宗英

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、作家黄宗英今日凌晨逝世,享年95岁

甜姐儿,微笑着走了……



爱上阿丹

很快,她主演的话剧《甜姐儿》便风靡一时,引得上海滩富家太太小姐争相模仿她在戏里的装束,还有带着自家裁缝去看戏的,要做戏中她大红呢上衣和白帆布马裤的同款造型。但也很快,太平洋战争爆发,剧团解散了。辗转流离,黄宗英始终没有放弃心中对艺术的欢喜和热爱,她始终记得那时候黄佐临说过的话,“有时应当什么都不干,就什么都不干,可以小做,就小做,应该大干,当然大干。”这或许才定了黄宗英的终身。

了他俩的定情之作《幸福狂想曲》,黄宗英的其它几部代表作品《丽人行》《乌鸦与麻雀》《聂耳》,也都是与赵丹合作的。“他一生坎坷,运动一个接一个,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好,就在他身后紧紧地抱住他,为他分忧。”两年前,我问黄宗英,觉得这一辈子苦不苦,她坚定地回答晚报说:“不苦,一点也不苦。”

1946年初涉银幕,黄宗英出演了沈浮导演的《追》,在里面扮一个买办家庭的大小姐,同情并掩护表哥去参加革命。戏不算太多,但她因此被昆仑厂的导演陈鲤庭和赵丹相中,1947年初夏她从北京来到上海,参演了《幸福狂想曲》。“影片中我们是情人,可是我有点怕他。”不承想,这个叫她有点怕的男人,这个已经演过十多年话剧、电影,蹲过五年大牢的男人,这两个只袜子不一样颜色的叫人有点心疼的男人,在电影扫尾工作时候,忽然孩子气地对她说:“我不能离开你,你应该是我的妻子。”很快,黄宗英跟第二任丈夫程述尧离婚,嫁给了赵丹。除

是的,不苦。她说,“赵丹一演戏,就把我也忘了,我就最喜欢他把我忘了的神情。”她说,阿丹出狱后面画了一幅千峰万壑锁不住的瀑布清泉,题诗“活泼泼地出山来”,任凭千难万阻,还是出来了。她说,“他是在知心观众热烈的掌声和更殷切的期待中,落下生命之幕的”,人去艺存,是艺人之幸。哪怕今年,黄宗英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,但当友人给她发来视频,告诉她去南通赵丹像前打扫过,看到雕像前摆着赵丹最喜欢的腊梅和金橘时,她会笑着认真地说“谢谢”。



黄宗英在电影《家》中扮演梅表姐



黄宗英和赵丹

那么热烈,那么潇洒。那时候每次进藏,或者去罗布泊,她都会留下“遗书”,交代我们要是发生意外,不设灵堂,不搞大型追悼会,甚至还说不发讣告。爸爸走的时候说,“人活着或者死了,都不要给他人带来痛苦”。今天,妈妈也真的走了,我想我也会尊重她的意思,简简单单地,家人和朋友送送她就好。人一辈子,来了,走了,我想她真的没有后悔过。”赵左顿了顿又说:“我想妈妈会跟大家讲,‘我走了,我深深地爱着你们。’”

首席记者 孙佳音

Sunday Essays 星期天夜光杯

黄宗英「小妹做到了」



十六岁出道,佐临勉勵

“上海话剧界前辈黄佐临,对我影响至深。他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戏剧家,还是一个杰出的教育家。他让我明白,一个出色的戏剧家,不仅要懂得演戏,还要懂得育人。他让我明白,一个出色的戏剧家,不仅要懂得演戏,还要懂得育人。他让我明白,一个出色的戏剧家,不仅要懂得演戏,还要懂得育人。”

国戏情缘,天下都乐

1946年年初涉银幕,黄宗英出演了沈浮导演的《追》,在里面扮一个买办家庭的大小姐,同情并掩护表哥去参加革命。戏不算太多,但她因此被昆仑厂的导演陈鲤庭和赵丹相中,1947年初夏她从北京来到上海,参演了《幸福狂想曲》。

尤其记得,师长教诲

黄宗英在电影《家》中扮演梅表姐,这是她第一次在银幕上亮相。她记得很清楚,那是1946年。她记得很清楚,那是1946年。她记得很清楚,那是1946年。

阅读写作,陪伴终身

黄宗英在电影《家》中扮演梅表姐,这是她第一次在银幕上亮相。她记得很清楚,那是1946年。她记得很清楚,那是1946年。她记得很清楚,那是1946年。

本报星期天夜光杯于2019年10月27日刊登黄宗英专访

走上舞台

1925年7月,黄宗英出生于北京。九岁那年父亲病故,家道中落,她只得得到天津投奔亲戚。初中毕业以后,黄宗英便开始考虑辍学养家为哥哥弟弟交学费,她自学打字、英文、临帖,想试着找个写字间的工作。1941年,哥哥黄宗江先到了上海演戏,唤她来,16岁的黄宗英便懵懵懂懂地来了。到上海的第二天,哥哥就带她去了卡尔登剧院(今长江剧场),那天剧院正在演《蜕变》,曹禺编剧,黄佐临导演。那一晚,舞台上下的爱国热情彼此融成一片,热烈、犀利、慷慨、沉痛……那一晚,演员们多次谢幕,观众迟迟不肯走,这都让年轻的黄宗英觉得,自己将要从事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。

隔日,黄佐临便安排这个高高的“小妹”做了舞台替补。从八九月间,到十月第一次上台,左右不过月余。快要80年过去,晚年的黄宗英始终记得那一晚。“糟糕,脚灯的光怎么这么亮,我什么也看不见,台上的人都站在哪儿?”还没有弄清楚是谁说到哪句话该上场,她便被舞台监督后背一拍给推了出去。被舞台吓呆了的黄宗英,赶忙把自己的台词一阵阵往外抛,最后提前大哭大闹起来,被人拖下场来。戏散了,黄佐临来到化妆间,惊魂未定的小女孩抬头看一眼,又低下头,觉得自己闯了大祸,没想到听到先生一字一字地说:“小妹,明天还你上。”16岁的女演员,就这样出道了。黄宗英说:“这定了我的终身。”

当上记者

时间往后推算,1965年起,黄宗英在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专职创作,她用散文的笔法来写报告文学,更用人生的热忱来写报告文学。从小没想当演员却当了演员,没想当作家却当了作家的黄宗英自称“老记者”,为了当好一名记者,她放弃安稳舒适的生活,东奔西走,翻山越岭,甚至风餐露宿,去往各地体验、采访、写作。不过她全身心投入,乐此不疲,哪怕危险。她说:“我不是胆小的人,也不是勇敢的人。我只不过想用笔向社会说话。”

在她的诸多报告文学作品中,写于1983年的《小木屋》是最为人熟知的一篇,讲述的是女科学家徐凤翔致力于建设高原生态研究站的故事。1985年,中央电视台为《小木屋》摄制专题片,她随摄制组再度入藏。影片在第二十八届纽约国际电影节上获得电视纪录片铜奖。1994年,69岁的黄宗英第三次跟随徐凤翔入藏考察,奔赴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地带,却不料发生了严重的高原反应,几乎到鬼门关转了一遭。躺在病榻上,她写了一篇小短文,题目叫《我不后悔》,“从此不能再去的地方,是特别诱人的”。如今母亲走了,有些地方再也不能去了,但赵左说:“我想我妈妈的一辈子,真的从来没有后悔过。她那么勇敢,

记者手记 红

孙佳音

红色棉袄、红色围巾、红色小帽,两年前的初冬,我去华东医院探望黄宗英,她一身大红,正捧着十英寸的小屏,专注地在看《乌鸦与麻雀》,阳光和煦、明亮、温暖,这一幕美好得叫人不忍打扰。第二天下午,我又去了,她在看《林则徐》。还是那一身红,因为“丹”就是红。因为总是会想起来阿丹,“想他的时候,就找出这些老片子,看一看”。

疫情以来,除了儿子赵左和医院的陪护,大家都不能再去看黄宗英了。不过,偶尔我也还能在视频里看到她,看到她穿着最喜欢的红毛衣,披着红色的外套,跟朋友热情问候“新年快乐”;也看到她在新冠疫情阻击战最严峻的关头,换了另一件红毛衣,戴上了红底白点的围巾,一头银发,握紧拳头,“铿锵有力”地念着,“中国加油,武汉加油,上海加油,奶奶加油”;还看到她戴着一顶红色毛线帽子,跟陪护阿姨说一句我一句地对答,“别说自己老了,别老说自己老了。根本别去想,自己老,还是不老……凭什么,说我老了,暮年该来的烦恼,找上了我,我就跟我还糟糕的人去比较,于是,坦然一笑,哈哈,还好,还好。”

黄宗英自己写的这首《别说自己老了》,她抄过很多遍,也诵读过很多遍。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,她会对着孩子们的照片凝视良久,也会偶尔地对答出诗里的话,“青春的节奏,还在我心中跳跃”。是啊,青春的节奏,始终在她心中跳跃,红彤彤的、欣欣然的生命热忱始终在她身体里绽放。

“老记者”黄宗英曾说,“热爱并执着于自己的爱好(专业),是幸福的。”95岁的她,带着她对艺术和文学的执着,带着她对生活本身的热爱,走了,我想她是幸福的。

